

隨筆·觀察

《隨想錄》的華蓋運

● 牧 惠

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我不願意空着雙手離開人世，我要寫，我絕不停止我的筆，讓它點燃火狠狠地燒我自己，到了我燒成灰燼的時候，我的愛、我的恨也不會在人間消失。
——巴金

1992年5月出版的《隨筆》上，有梁秉堃一篇很有份量的文章〈解答帶來了沉重〉。文章說，1983年春天，曹禺把畫家黃永玉給他的信讀給來華訪問的美國著名劇作家、《推銷員之死》作者阿瑟·米勒聽。信中說：「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裏，你失去了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你泥濘於在不情願的藝術創作中，像晚上喝了濃茶清醒於混沌之中。命題不鞏固，不縝密，演繹、分析得不透徹。過去數不盡的精妙的休止符、節拍、冷熱、快慢的安排，那一籬一筐的雋語都消失了。」客人不懂曹禺這一手是甚麼意思，陪客人的梁秉堃卻明白，這封信是敲打在曹禺心上一把無情的鐵錘，促使他回顧後半生的創作道路。果

然，經過一段時間思考後，曹禺說了一番話：

我七十七歲了，後悔讀書讀得雜，讀得亂，好像沒有讀透過一本書。解放後，總是搞運動，從批判《武訓傳》開始，運動沒有中斷過。雖然，我沒當上右派，但也是把我的心弄得都不敢跳動了。

做人真是難啊！……（《王佐斷臂》）這個故事還是挺耐人尋思的。明白了，人也殘廢了，大好的光陰也浪費了。

平心而論，黃永玉對曹禺的指責過重了一些。把責任都推到曹禺頭上，顯然有「責備賢者」的過頭之處。除此之外，曹禺的遭遇很有代表性。回顧一下解放以來這四十年的文藝界

狀況，在解放前已經有過卓越成就、寫出過不少優秀作品的作家，在解放後十有八九是成績平平，有如黃永玉形容的一個個似乎都像賈寶玉失去通靈寶玉之後那樣沒了靈性。這當然不是作家本人的過錯，而是出於對知識分子一直極不信任的動因，老從文藝界開刀，沒完沒了地搞那些以大批判開路的政治運動，使得作家、藝術家或者「心弄得都不敢跳動」，寫出一些沒有靈氣的遵命作品，或者靈氣稍一冒頭就被打成「分子」，發配到北大荒去伐木，似乎根本不需要也不允許產生出新時代的大作家。哪怕魯迅也不例外。不是早就有人宣佈魯迅雜文過時了嗎？人們不無理由地說，假如魯迅活着，如果不是甚麼「集團」，最少也會成為「分子」。

因此，巴金在「文革」後終於寫出了一厚本《隨想錄》，確是在文學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盛事。巴金早年寫出的《家》、《春》、《秋》等一批熱情奔放、愛憎鮮明的小說，曾經啟發過我們當中許多人迷惘的心靈，促使我們前進，走上革命的道路。解放後，巴金也寫過一些作品：但是，請恕我無禮直言，除了一些雜文偶然講出一些人民的心裏話外，不少作品也與黃永玉評曹禺作品的話相似。有甚麼辦法呢？在「文藝紅線」的統治下，加上柯慶施、張春橋、姚文元的鞭子時時在頭上飛舞，「不槍斃就是落實政策」（張春橋語），還能要求巴金寫出像《家》、《春》、《秋》那樣的作品來嗎？只是在打倒了「四人幫」，人們從噩夢中驚醒過來，「左」的那一套開始被唾棄了，才有了產生《隨想錄》的社會條件。

《隨想錄》將是一本不朽的書。在這本書裏，充滿了對「文革」時代滅絕

人性的封建法西斯主義的控訴，嚴格地剖析自己、鞭撻自己靈魂中的毒氣和鬼氣，號召並且帶頭講真話。誠如丹晨所說，《隨想錄》作為一代知識分子的覺醒和痛苦的思考的結晶，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學現象，必將受到後人的注意和研究，儘管有人挑剔和討厭，《隨想錄》卻不會消失。

《隨想錄》得到中外廣大讀者的喜愛，這一方面，從它的一再重印，從在上海書市上它的暢銷和一位女工以非常高的價格購買這本書的熱烈動人情景可以看得出來。但是，在某些人看來，《隨想錄》卻是一枚不受歡迎的苦澀而有毒的果實。巴金說，《隨想錄》在香港《大公報》「大公園」發表，「連載不到十幾篇，就有各種各類嘖嘖喳喳傳到我的耳裏。有人揚言我在香港發表文章犯了錯誤：朋友從北京來信說是上海要對我進行批評：還有人在某種場合宣傳我堅持『不同政見』。」巴金的這番話當然不是庸人自



擾，比他所說的更嚴重的明明暗暗的討伐有的是。

為甚麼巴金的《隨想錄》那麼招恨呢？巴金也明白：「因為我要人們牢牢記住『文革』。」「他們不讓建立『文革博物館』，有的人甚至不許談論『文革』，要大家都盡快忘記在我們國土上發生過的那些事情。」

巴金的話也對也不對。仇恨巴金的，有人並不想大家忘記「文革」，而是千方百計為「文革」歌功頌德，唱樣板戲是一回，「紅太陽」也熱鬧過一陣，還有人開座談會讓當年被迫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談「與工農相結合」的豐碩成果，甚至說「文革」揪走資派是對的，走資派現在還在走，資產階級確在黨內，只是不該層層揪而已……他們要人忘記的，是在「文革」中發生過的種種醜惡。他們不想人老是談論這些，甚至下令禁止新編地方誌記述「文革」，因為只要寫「文革」史，就必然會或多或少（即使猛打折扣）接觸到這一恐怖時期的種種醜惡和令人髮指的罪行。而巴金的「可惡」之處，則是他偏偏談的是「文革」的這一面。對巴金的這種厭惡之情，開始只是悄悄地傳播着，頂了不得是在會上罵。形諸文字，公開在報刊上指責巴金的，恐怕得算是1988年第六期《文學自由談》上張放的〈關於《隨想錄》評價的思考〉。這篇文章說，《隨想錄》未竟卷時，就已掌聲四起。幾乎一段時間，滿目盡見讚譽極至的話語。「我以近乎膜拜的心情讀了這套書，然而，我不能說假話，不能冒飾自己『一口氣讀完』，而是幾番努力未竟終卷。」原因在於「巴老的《隨想錄》實在是在不斷地重複」他自己，五卷書題材雖異，但歸結起來大體是：文化大革命，「四人幫」時代是滅絕人性

的浩劫，萬萬不能再有了；自己在那時的屈服甚至謬從是不可原諒的；從今以後我們大家都要汲取沉痛教訓，要講真話，向着光明飛奔。張放還說，從文學的角度看，內涵重複的篇章，觀一知餘，始終無變化的結構，語言一味平直，無論如何講，其文學魅力都難以盡如人意。

張放的文章發表後，邵燕祥、丹晨很快就發表了反批評文章。

丹晨針對張放「滿目盡見讚譽極至的話語」這一說法指出，巴金從1978年開始陸續發表《隨想錄》，直到1986年8月完成五卷一百五十篇之前，在長達八年的時間裏，國內發表的有關評論文章加起來也不到十篇。有的評論文章也是幾經輾轉拖延才得以發表的。全國性的重要報刊幾乎沒有對此表過態，更沒有甚麼單位出來組織討論會。而且，第一卷那寒儉簡陋的裝幀是少見的，第二卷的出版更是困難重重，拖延許久才得問世。當時有些權威人士對於《隨想錄》不感興趣，不時傳出種種批評和指責。八年中哪有甚麼「漫天的彩虹」！倒是海外有強烈的反應和崇高的評價，比起國內要熱情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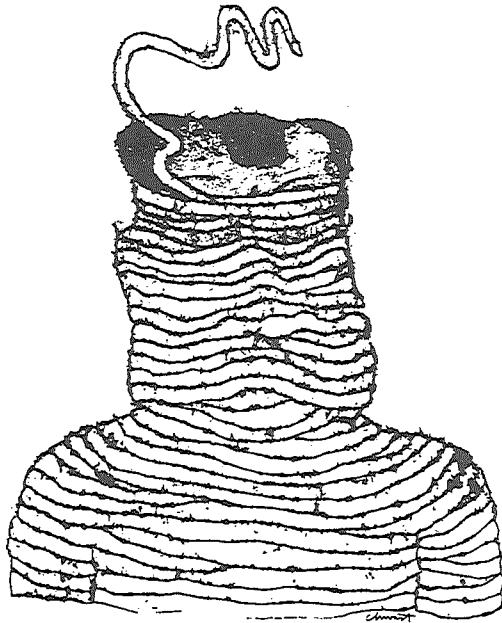
至於寫「文革」的問題，邵燕祥、丹晨和別的雜文家如黃秋耘等都認為，關於「文革」，現在不是寫得太多，而是寫得太少，寫得極不夠。「文革」這段「史無前例」的歷史現象，亟需歷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一代又一代不斷反覆總結、反思。這是無法迴避的，也是不得不正視的痛苦事實。何況，「文革」的幽魂未必完全消失，為「文革」英雄張目的事情何嘗沒有，襲用「文革」故技的也不乏其人。因此，「文革」就是「最現實的是非風雲」之一。張放要求巴金

別老談「文革」，多談點目前即「文革」後的現實的是非風雲，一方面反映出他由於沒有認真讀《隨想錄》而根本不知道巴金其實也談過不少「文革」後的問題，開卷第一、二篇談的就是電影《望鄉》被禁無理。未看完就批，甚至不看就猛批，可以說是某種人的一種共性。巴金老人也難逃脫這種「大批判」，正好說明「文革」確需大談特談，談個沒完。

邵燕祥進一步指出，「《隨想錄》使讀者受益解惑的首先是張放指為『不斷重複』的『文革』主題」。張放厭煩得很，想讓巴金說些「文革」以外的「真話」。「這是點將，還是叫陣？是明知巴金高齡帶病，寫作困難，而故意『站着說話不腰疼』，將一軍，要個『好看』？或者，不過是出一個『文革後』的題目，來封談論『文革』之口？」「讀了張放的高論，先以為論者是執着於『純文學的標尺』，但是聯繫『最現實的是非風雲』想一想，發現也不過是說了社會上某些人未曾完全形諸文字的話——這些話其實與文學無關。」也許張放主觀上沒有這種動機；但是，這篇文章無論如何在客觀上起了說出了某些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這種惡劣的作用。

「說真話並不是文學價值的唯一準則」，張放這句貶低說真話的真話從文字上看並沒有甚麼不當。但是，張放可曾知道，在中國，說真話多麼困難，要有多大勇氣，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因為有人歷來反對說真話，現在仍在反對說真話。巴金之所以招恨，原因之一也是他竟然說了那麼些真話。

60年代初期，巴金曾經忍無可忍地說了一次真話，那就是他在上海文藝界一次會上以〈作家的勇氣和責任



對知識分子來說，講真話與否都是個重負。

心〉為題的講話。巴金自我批評「講得多，寫得少」，「缺乏勇氣，責任心不夠，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原因是害怕「言多必失」，招來麻煩。「我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處找毛病的人」，「他們今天說這篇文章歪曲某一種人的形象，明天又說那一位作家誣蔑了我們新社會的生活，好像我們偉大祖國只屬於他們極少數的人，沒有他們點頭，誰也不能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僅僅講了這幾句真話，當時的上海皇帝柯慶施就大發雷霆，姚文元之流拿着棍子等着。「文革」一來，這番真話連同他的「反革命」的《激流三部曲》一起，成了「不槍斃他就是落實政策」的罪證。

「文革」之後，講真話也並不那麼容易，不那麼受人歡迎。就「目前最現實的是非風雲，及那些最不能使一般青年明白的現象，哪怕發表點滴『真話』」，也是談何容易。巴金講得很清楚：我所謂真話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確的話，自己想甚麼就講甚麼：自己怎麼想就怎麼說。但是，十

年之後的1991-92年，在《人民日報》上，仍有人在那裏喋喋不休地教導巴金在內的人們，「說的符合實際，不誇大，不縮小，沒有片面性」，才叫講真話。要不然，「誇誇其談的捕風捉影，嘩眾取寵者的鏡花水月，造謠誣陷者的蜚短流長，覓怪撒謊者的無稽謬言，豈不都可以叫真話？那樣提倡講真話，魚龍混雜，良莠競榮，能有甚麼意義。」這種把提倡講真話者硬推到罪犯位置上的奇談怪論，使得有人忍不住冒風險站出來反駁：這麼個高難度的「真話標準」，實際上是把真話與真理混淆，無異於要求人們說的「句句是真理」，結果只能是不說話或只說套話、兩面話之類。於是，這位作者理所當然地遭到反擊，另一個反亂講真話論者說，「真話不但要出乎真心，而且要合乎實情」，「真假就不能以你是否真心而只能以客觀實在去檢定」。本來，甚麼叫做真話，甚麼叫做假話，是小學生也不難分辨的常識，經他們這麼一「討論」，反而讓人糊塗了。講真話既然有那麼嚴格的律令在，你敢亂講真話嗎？需知，「檢定」權可是握在他們手裏。你說大躍進搞糟了，這不是真話。因為根據他的「客觀實在去檢定」，「大躍進」成績很大很大很大。講大躍進壞話的人講的是造謠誣蔑的假話，理應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你說「文革」必須全盤否定，這不是真話。根據他的「客觀實在去檢定」，「文革」中有兩條路線鬥爭，幾千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走與工農相結合的光輝道路，經濟建設還是有所發展，包括巴金在內的否定「文革」的言論實屬不合乎實情的「捕風捉影」、「蜚短流長」。你說黨風不正，腐敗嚴重，他們在1982年就宣佈，現在黨風已經開始好轉，雜文家

跟不上形勢，落後了。再多嘴就是「自由化」。

本來，否定「文革」，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也做出了決議的。但是，決議歸決議，聽不聽卻是「自由」。1991年秋天，國際巴金學術討論會在成都舉行。大會購買了巴金《講真話的書》，與會人員人手一冊。領到這本書的人發現，在目錄中收入了理應排在本書1,026頁的巴金《隨想錄》之一的〈「文革」博物館〉，卻是一頁只有文章題目的白頁；這一件發人深思的鐵的事實，到底說明了甚麼，大概用不着我饒舌了。

* * * * *

案：本文寄出後，收到一本傾向鮮明的討論「講真話」的雜誌，共收文章五篇。其中一篇是重複「其話不但要出乎真心，而且要合實情」的楚怡文章〈真話與真實〉，內容仍不過把「造謠誣蔑」之類也歸入「真話」而加以醜化。值得注意的倒是文後註明「原載1992年《人民日報》」。據該報並未見過此文。有人打電話責問該刊主編何以作假，主編無言以對，可見他心裏也明白這是搗鬼。反對「心裏怎麼想，口裏就怎麼說」的人，原來是「心裏怎麼想，口裏卻那麼說」。這一「佳話」，可以作反對講真話者一極妙註腳。

牧 惠 廣東新會人，1928年出生。為雜文家及古典文學評論家，著作有雜文集《湖濱拾萃》及古典文學論集《金瓶湖話》等十餘種。